

东陵人物选传

· 文史资料增刊 ·

政协沈阳市东陵区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989·9

主 编：吴学贤

副主编：王铁铮 那相国

编 委：戴诗铎 蔡南昌 程云龙

张济洲 肇恒昌 罗正贵

李桂凤 张桂芝 姜 越

杨贞叔 胡有铎 李哲时

王铁柱 赵忠允

序

东陵区人杰地灵，在这块土地上，活跃着众多历史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历史是通过人物活动展现的，我们编辑《东陵人物选传》，是要通过他们的活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东陵区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是漫长的，东陵区的地域也是广阔的，而且是历史名城——沈阳之一隅，在此活动的人物众多，本书只收入二十二人，其他将待陆续整理编印。本书是采用记实性传记形式写成，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不加褒贬，任读者评说。

《东陵人物选传》是一本地方性、统战性、知识性、资料性文史书刊。读者读后，能透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了解东陵区的历史发展，是我们的愿望。但是，由于时间紧，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和失误，请读者鉴谅。

陈维海

目 录

爱国将领郭松龄将军·····	吴学贤 (1)
辉山宁二傻·····	那相国 (18)
刀劈鬼子的王殿荣·····	王铁铮 (24)
郝义区长·····	蔡南昌 (31)
烈士裴警予·····	戴诗铎 (36)
英雄团长戴吴·····	戴诗铎 (43)
林子升传略·····	衣天杰 (59)
作家蔡天心·····	王永满、戴诗铎 (67)
农民的儿子孙庆柏·····	郑雅学 (74)
种子大王巨连升·····	程云龙 (82)
共和国的同龄人乔成庆·····	王铁铮 (87)
勇于探索的石耕田·····	李桂凤 (94)
农民企业家刘士成·····	胡有锋 (98)
知难而进的刘万林·····	胡有锋 (103)
顽强奋进的胡显亮·····	胡有锋 (110)
勃勃雄心的任春山·····	吴学贤 (115)
异军突起的马红龙·····	姜越、吴学贤 (120)
朝鲜族企业家徐基珠·····	张桂芝 (127)
百万富翁刘希贵·····	那相国 (136)
实干家佟福功·····	扬贞权 (142)
精明强干的郑永江·····	赵忠允、王铁柱 (146)
运输专业户张永财·····	郭绍山 (151)

爱国将领郭松龄将军

郭松龄，字茂宸，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生于今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李家堡。据谱书溯源和郭家后人代代传述，郭氏一门系李唐王朝中兴名将汾阳王郭子仪后裔，世居山西汾阳；其远祖在明朝时曾戍边来东北，松龄曾祖父一支，在关东开禁后，随同逃荒难民移居本溪一带，祖父时才迁到渔樵村落户。

家境清贫，苦难少年

郭家客居沈阳，以农耕为业，好年景可聊以卒岁，如遇饥荒就入不敷出。在松龄祖父母去世时，竟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只得草草埋在村西小沙河的河滩上。后来小沙河涨水，把棺木尸骨冲走，再也无处寻觅。

松龄的父亲名复兴，字恢原，是一位有真才实学，勤于职守，深受学生和长辈尊敬的乡塾教师。因为家境清贫，颠连无靠，在年近三十岁时，才与本村李氏农家女子结婚。李氏豁达明理，贤慧慈爱，勤劳节俭，克守妇道，是一位典型农村妇女。松龄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而且是首出，理应是幸福和欢乐的。然而，窘困和饥饿夺走了他应有的这些。童年的松龄，没穿过一件新衣，冬天更没有棉衣、棉鞋，常常蜷缩在炕头上或草窠里，饿肚子是常事。

常言说：“家贫出孝子”，松龄小时很懂事，才七、八

岁就说服父母，去为人家放猪；十二、三岁就经常帮助父亲上山砍柴，下河捕鱼捉虾，背到附近镇上或城里去卖，换些粗米油盐度命；十四岁就开始到财主家做长工，当“半拉子”。严酷的现实生活，使小松龄过早地领略了人世间的辛酸和不平。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恨富人的种子。

勤奋好学、智慧超人

松龄生活在书香门第，诗礼之家，父母的影响，家庭的熏陶，加之他生性聪明，自幼年起就跟父亲学识字，背诵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九岁时正值他父亲受聘到尖山子村学馆授课，全家迁至该村安家堡，松龄随父上学读书。十二岁那年，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乡民们惶恐不安，学馆停学，于次年全家复迁回渔樵村。父母见松龄天资聪慧、记忆超人，在三年私塾中，不但学习成绩优秀，名列榜首，而且在课外还学习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等儒家四书。虽家境贫寒，又送他到富家屯富德丰老先生学馆就读，后来，因生活所迫，仅念了二年便又辍学。但，松龄并没扔下书本。父亲给他讲的“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和“悬梁刺股”等古人发愤读书的故事，一直在鼓舞着他手不释卷。古文、诗词和历史传记他都很喜欢，特别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父亲给他讲述的远祖郭子仪中兴唐王朝的故事，更使他难忘。这些，对松龄后来选择军人职业都有一定的影响。

松龄思维敏捷，理解能力极强，所以，他的智慧也超过一般人。一次，村中戴家在夜间丢失一匹马，四处觅寻不

得；松龄闻讯后，偕几位同学帮助失主寻找，在天黑时，他和小伙伴们从阿杭村，将马拉回。同学和村民们都很赞服，郭松龄有道眼，将来定有出息。

作父母的，谁都望子成龙。他们见儿子如此聪敏，又十分好学，绝不能因家境误了孩子的前程。所以，在松龄十九岁那年，又把他送到常王寨董汉儒老先生开设的书院去深造。在这里除了学习更高深的文化知识外，又受到董老先生爱国思想的熏陶，松龄很爱听老先生给他们讲述的中国历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的故事，特别崇敬汉朝赵充国老将军屯田戍边抗击匈奴的报国精神。这对他后来主张“开发东北，巩固国防”有一定影响。

矢志报国，报笔从戎

松龄青少年时期，目睹了世界列强发动侵略并瓜分中国的甲午、庚子和日俄三次战争给东三省百姓带来的灾难。他几次辍学，即有家庭经济因素，更因战乱所造成。战争使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大妇亲朋呼于路。”尤其是日俄战争，主战场就在辽东，家乡一带，不少房屋被炮毁火烧，众多乡亲被打死打伤，常王寨学馆也是毁于炮火，学生无法上课。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青年郭松龄，在先人名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强烈地冲击下，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从军救国之路。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次年，该校内增设“陆军速成将弁学堂”，即通称“老速成”。这个班的学员多是由清新军下级军官中考选，因松龄入校后学习成绩优异，也被选送速成

班。一九〇七年夏毕业，因考试名列优等第一，被学堂总办袁克定选送到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回奉任东三省总督衙门卫队哨长（相当于排长）。由于松龄带兵有术，勤于职守，深得统领朱庆澜将军赏识，擢升卫队哨官（相当于连长），并倚为亲兵。一九〇九年朱庆澜被调往四川成都，松龄亦随朱入川。一九一〇年冬朱庆澜部，扩编为陆军第十七镇，朱任统领官。次年春，松龄被提升为该镇六十八标第二营营长。这年他二十九岁。松龄投身军旅为报效国家，使民族自强，免受强邻之辱，绝不为虎作伥。在他任营长时，四川正值爆发了群众爱国保路运动。总督赵尔丰下令镇压持械围城之群众时，松龄奉命带全营官兵守卫成都北门，东南西三门俱以炮火弹压群众，唯北门郭松龄婉劝防军官兵不许动用武力，并赞许群众争路系爱国行为。因此，兵不血刃，以解重围。正由于这个原因，上峰对松龄的表现大为不满，要夺其兵柄并予以惩处，在朱庆澜百般庇护下才免遭处治。

四方奔走、投身革命

松龄为国家不受强邻俄、日等国欺辱，投身军旅，五、六年时间的体察，他清楚地认识到，队伍中虽有像朱庆澜那样廉洁勤政的将领，有方声涛、叶荃那样爱国军官，可他们上面还有腐败的清政府指挥着军队的一切。镇压保路运动之举，使他痛切感到“国事日非”、“清政不纲”。走从军救国之路，极难实现。欲达救国图强愿望，必须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非以武力“颠覆清室”不可。一九一一年，由方声涛、叶荃二人介绍，郭松龄加入了四川新军中国同盟会组织。从此，他便成了一名自觉的爱国民主战士。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新军中同盟会员秘密酝酿响应，争取拥戴朱庆澜宣告独立，赞成共和。但因十二月八日发生“兵变”，提出由川人治川口号，他们均被迫离开四川。此时，松龄决定回家乡奉天策应革命。他回到奉天时，正值兰天蔚、张榕的“和平独立”计划败露，赵尔巽调张作霖镇压革命运动。所以，只得秘密潜入奉天城，后经韩淑秀介绍，与革命党人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接上关系。这个革命机关就设在韩宅。此后，他常与张榕、宝昆、田亚斌等同盟会员一起商讨武装起义事宜。老奸巨滑的赵尔巽，在作好准备之后，于十一月十二日窃据了“保安会”大权，从此，便撕下伪装，下令搜捕革命党人。张榕、宝昆、田亚斌相继被害。松龄因剪发易服，并身畔挟有民军护照，在西关二龙坑，被汤玉麟部逮捕入狱。后经韩淑秀等人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获释。松龄与淑秀，志同道合，又经过这样一段生死之缘，终结成了终身伴侣。

松龄从奉天革命党起义的教训中，深深体验到：“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这个道理。他决心把自己造就成一个革命需要的军事人才。因此，在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由于成绩优异，被拔充区队长。张锡銓督奉时调松龄任督署参谋。一九一三年秋，复以参谋资格考入北京陆军大学（为深造班第四期）。在此期间，松龄除了刻苦学好军事科学，努力研读德、日等国近代军事科学外，还如饥似渴地吸取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因此，他后来能文能武，是奉军中唯一有“儒将”之称的人。一九一六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受聘于

北京讲武堂任教官。优厚的收入，安适的生活，非松龄所求。他目睹了民国以来，国家并没有强盛，仍然你争他夺，民众不得安生。所以，当他获悉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时，一九一七年，毅然离京赴粤，投奔护法军政府。经当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介绍，先后任粤、赣、湘边防督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此时，松龄曾拜谒孙先生，并大胆向先生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而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孙先生深韪其言。先生根据松龄建议，为培养革命军官，在韶关成立了讲武堂，聘请松龄为中校教官。从此，他便以对革命的赤诚，竭尽心力为军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松龄在粤期间，因工作之便，曾多次谒见孙中山先生，直接聆听先生教诲。对孙先生提出的革命目标，坚信不移。对孙先生那种勇敢进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由衷地敬佩。决心以全力协助孙先生为实现其革命目标而工作。然而，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军政府没有自己的武装，恶军阀取代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被迫通电辞职，郭松龄也不得不另选择自己继续革命的基地和道路。

潜志返奉 蓄养势力

一九一八年五月，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先生辞去大元帅职务，一批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和军队，相继离开广州。松龄于同年秋，胸怀壮志返回奉天。不久，经督军署参谋长秦华（松龄在陆大同学）推荐，进入奉天督军署任少校参谋。一九一九年春，张作霖为扩充军队，急需干部，重

建东北陆军讲武堂，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他虽已入了奉军，但仍被人怀疑。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见松龄在场亦厉声说：“汝曾作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可见松龄的处境是险恶的。他人单势孤，同道甚少，欲立足，开创局面，困难重重是不言而喻的。他常用宋朝邵雍的五言诗《清夜吟》：“月至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抒发自己的心迹，砥砺自己的意志。

吉人自有天相。松龄在讲武堂有幸结识了张学良。他经过多方细心观察，学良虽出身军阀家庭，但他的思想与其父截然不同，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进取心，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他二人结纳师生之谊，终成莫逆。所以，松龄不仅要求学良学好学、术各科课程，而且，有意识地向他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希望他能承袭其父地位，以便实现自己返奉初衷。因此，松龄劝学良别练新军，异日以继承乃父。学良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对松龄之言有动于衷，又爱其学识，慕其品格，遂生有罗为已用之念。一九二〇年春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接替了张作相兼任的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职务，不久，就荐举松龄到该旅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的职。从此，郭松龄开始了领兵作战的戎马生涯。为实现其攫取兵权，根本改造东北三省的总体构想，打下了基础。但是，若想成其大事，还必须进一步得到张氏父子的信任，奉军中官兵的拥戴。因此，他竭尽心力，辅佐张学良，从部队的行政管理，军事训练，作战指挥等诸多方面参赞帷幄外，并具体领导实施。这样，既减轻张学良的负担，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由于松龄有效地训练教育部队，卫队旅的军事素质迅速提高，首先成为奉军精锐之师。一九

二〇年直皖战起，张作霖命松龄率部入关，在天津小站一带，以一个团兵力与龙济光两旅之众交锋，众寡悬殊，奉军却以少胜多，松龄威名鹊起。四年后，松龄又随学良率部赴黑龙江、吉林剿匪。征战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与士兵同甘共苦，且军纪严明，表现不凡，军事才能日显，有口皆碑。不但为张学良所倚重，而且渐为张作霖所信任。一九二一年五月，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时，乘机将奉军扩编为十个混成旅，改任张学良为第三旅旅长，提升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称三、八旅。因张学良常在其父总司令部参赞军机，三、八旅的一切事宜均由松龄一人负责。松龄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张学良虽年轻，可是能知人善任，郭对张忠心耿耿，张对郭推心置腹，二人情同手足。张经常向人们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至此，松龄已实现了掌握兵权的初步计划。以后，又建议张学良，扩充讲武堂，设立军官教育班、教导团和军士教导队，并亲自担任教官和训练任务。这些措施，对他罗致人才，提高奉军素质，收到了显著效果。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与影响也与日俱增。

直奉首战，初萌反念

久怀“问鼎中原”野心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以“调停”直皖战争之机派兵入关，兵不血刃抢先进入了北京南苑，并搜缴皖系大批军械，辎重、财物达百车运回奉天，引起了直系军阀极大不满。双方不仅在争夺地盘上发生尖锐矛盾，而且在组阁北京政府上也水火不能相容。因此，双方都准备兵戎相见。一九二二年四月，经过准备的直奉两方开始

调兵遣将，爆发了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直奉战争。松龄虽不愿参加这场不义之战，他当时的处境和条件，也不能公开违令，只得相机行事了。四月二十八日，直奉两军开始接火，五月二日，西线奉军，由于张景惠指挥无能，被直军抄了后路，溃不成军。东线方面虽有张学良、郭松龄所在的二梯队取得小胜，亦无法挽回整个战局。张作霖不得不下令撤军。

奉军平日缺乏训练，素质极差，撤退时狼狈不堪，纪律很坏，路经之处，抢掠民财，奸淫妇女，老百姓闭门逃匿，十室九空。松龄率队后撤时，见此情景心里十分不安，除命令所部官兵，撤退途中不准骚扰百姓，整肃军纪外，开始萌发反奉之念。经过对全局分析，他认为，“张氏新败，覆之不难”，只是吴佩孚野心勃勃，实力又强，若乘机入奉取代张氏，自己目前尚无“拒虎进狼”之力，如武力倒张，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决定遣密使去见吴佩孚，要求停战，由他所在的第二梯队联络各军，迫使张作霖下野，实行三省自治。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郭松龄第一次反奉之举。吴佩孚见战机有利于己，根本不同意与郭松龄合作，企图一举攻克山海关，直驱奉天，扫平张作霖老巢取而代之。审时度世的松龄，此时不得不决定联合三梯队李景林抗吴，以打破他的梦想和狂妄野心。郭、李两部在山海关西的徐家岭，抚宁、临榆以北构筑阵地与直军作最后抵抗。此役是第一次直奉战中有名的“山海关战役”。是奉军史上著名的“败军胜仗”典型战例。经过十数天的激烈战斗，直军不仅没能突破奉军防线，反而被奉军反击所突破，迫使直军退到第二线阵地。吴佩孚见无战胜郭松龄之可能，六月中旬，被迫接受和议，第一次直奉军阀混战宣告结束。松龄在这次战争中，指挥他

的部队，不仅败而不溃，而且还阻击了直军进攻，打破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关外免遭一次战火蹂躏。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因为这次阻击的胜利，也稳住了，张氏父子增加了对松龄的好感和信任。这次战役也充分显示了松龄的军事指挥才能。

利用整军、谋取兵权

松龄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他内心受到很大刺激和震动。他痛切地感到“内战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因此，在战后，他联合所部少数爱国将领，上书张作霖，提出“罢兵息争，闭关图治，移兵开垦，巩固边境”的建议。张作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日本的支持下，正着手整军经武，扩军备战，对松龄等人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松龄从实践中逐渐领悟到，改良主义办法，根本改变不了张作霖的军阀统治，如此下去，自己改造东三省的夙愿将化为泡影。因此，他决计利用张作霖整军经武的机会，掌握奉军统帅权，作为制止内战，改革东三省和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然而，杨宇霆一伙，依靠张作霖的信任和庇护，却把持了整理奉军大权。企图排斥郭松龄，架空张学良，以实现他们总揽奉军兵权之计划。杨宇霆一伙的这一阴谋，早已被松龄和学良识破。学良以公务繁忙为由，请求总司令部同意委任松龄代理他的陆军整理处参谋长职务。这就打破了杨宇霆等人的美梦，实现了由松龄主持陆军整理处工作的设想。松龄凭借学良的帮助和支持，以三、八旅（整编后改为二、六旅）为基础，对奉军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

扩编二、六旅为师的建制（番号不变）裁汰老弱，精选青壮年入伍，加强军训和爱国主义教育。（二）成立军官教导处、军士教育班，提高中、下级干部素质。（三）每年两次校阅部队，对官兵进行严格考核，实行优提劣汰或优奖劣惩，毫不留情。（四）整伤军纪，奖罚严明，官兵如违犯军纪或扰害百姓者一律严惩不贷。（五）实行独立军需制度，严禁官佐克扣军饷或贪占军款等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不到二年时间，二、六旅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军容军纪有了显著改观，因此，被誉为奉军“模范部队”。从此，松龄的名望日高，权势倍增，成为奉军将领中佼佼者。他利用整军经武机会掌握了奉军精锐之师。

然而，松龄考虑与学良及各方面关系，虽已重兵在握，仍多次向张作霖提出保境安民，移兵开垦等主张。还具体提出了改革东北的六项方案，即：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恳请张作霖，允许他率所部官兵，“赴洮南屯垦，寓兵于农”。张作霖的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与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加上杨宇霆等人从中诋毁中伤，根本不可能接受松龄的改革意见。

联冯拥孙 再反奉张

第一次直奉战争败北的张作霖，对直系一直耿耿于怀，时时在窥测方向，寻机要报“一箭之仇”。一九二四年九月张作霖趁江浙军阀争上海地盘之机，将所部奉军编为六个军与直交战，这就是历史称之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松龄被任命为张学良的第三军副军长。根据总司令部命令，他们

指挥的三军与姜登选，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组成一、三联军，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主攻任务。九月十七日，直奉双方混战开始，松龄率二、六旅为前锋，与直军展开了殊死战斗。此间，松龄虽与姜、韩发生矛盾，但未影响战局，松龄乘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撤七万多兵力回救北京之机，率四个旅包抄直军后路成功。一举俘敌五万余人，除少数自愿离去外，大部改编为奉军。松龄见直军已被夺势，奉军军威大振，这正是推翻张作霖的有利时机。于是，乃与几亲近将领再议倒张之策。并派其弟大鸣与顾问李坚白入京，去见冯玉祥将军，接洽合作。因多方面原因，亦未果行。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郭松龄第二次反奉。

冯玉祥虽未接纳松龄反奉意见，但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威望和实力，还不能控制中国政局，改造中国更非胜任，唯有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才是良策。于是，他一方面将自己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一方面电请孙先生北上。松龄一向非常敬重中山先生。得到冯将军电请孙先生消息后，一扫联冯未果对中国前途的忧虑，特别高兴地等待着中山先生的到来。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带病北上，十二月四日到天津后下榻张园。松龄立即登门求见。孙先生在七年前曾多次见过松龄，对他颇有了解，因此，破例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松龄聆听了先生切中时政的救国方略，心里十分高兴，深觉救国有望。表示愿为实现孙先生的主张，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松龄回去之后，向张作霖转达了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主张，并劝说张作霖支援孙先生。张作霖心存武力统一之念，非但不从其计，反而联合段祺瑞提出“外崇国

信”（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开所谓“善后会议”（由军阀、官僚、政客参加的会议）的反动主张，以与中山先生相对抗。孙先生因劳累过度 and 气愤，肝病复发，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与世长辞。松龄对先生的不幸逝世，非常悲愤，亲派其弟大鸣和好友李坚白二人，代表他到北京参加追悼祭奠，并留他们住在北京担任与国民军联络任务。

组织联盟、倒戈反奉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松龄预感到中国政局必将重新陷入混乱局面，只有与冯玉祥通力合作，并广泛联络有识之士共同担负匡扶中华之大任，中国的前途或许尚有可为。因此，他除了派人到北京专门担任联络外，还通过陆大同学，京汉铁路局长王乃模向冯玉祥表示，愿与其合作救国的心意。后来又通过他的夫人韩淑秀与冯的夫人李德全的同学关系，经常保持来往，表示合作诚意。冯玉祥也经常派参谋长刘骧、张之江等与松龄接触。一九二四年秋，冯派高级参谋张树声专程赴天津会见松龄，并送一座上面刻有“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八个字的银盾。这表明郭、冯反张已达成默契。

一九二五年，奉军大举入关，张学良、郭松龄所部“下秦皇岛时，降直军六万”扩编为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特设京榆驻军司令部于天津，张、郭为正付司令，控制京奉路沿线。这一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扩张最猖狂的一年。不仅控制了京津、直、鲁，而且兵进苏皖，直至长江下游的上海市。松龄常对人们说：“杨宇霆、姜登选一字长蛇地向南伴，早晚一定要倒霉。”那些人根本不听松龄劝阻，仍然一意孤行。十月六日，松龄忧心忡忡赴日本观操。在日本期